

提升香港港口協調能力 應對全球供應鏈動盪

黎雄基 | 香港理工大學講座教授、航運研究中心主任

美伊戰爭再起，紅海及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持續緊張，牽動全球航運市場。對不少香港市民而言，最直接的聯想或許是貨船繞道、運費上升，以及部分入口貨品或會延遲抵港。然而，這場危機真正值得關注之處，並不止於航線延長或運輸成本增加，而在於其正透過國際航運網絡，拖慢整個全球港口系統的運作。這種影響並不局限於紅海周邊港口。凡是與主要航線、樞紐港及轉運網絡緊密相連的港口，即使地理距離遙遠，亦可能受到連鎖波及。

對香港而言，這一點尤其重要。香港的航運競爭力，從來不僅來自地理位置，更建基於高效的轉運能力、密集的班輪銜接、成熟的物流服務，以及供應鏈穩定性。當全球港口網絡因地緣政治風險而出現震盪，香港在全球航運網絡中所處的位置，會如何放大或緩衝外部衝擊？香港又能否在風險中把握新的轉運和高增值物流機遇？

牽一髮而動全身

筆者團隊利用全球港口數據進行分析後發現，紅海危機已令港口整體周轉時間顯著上升，而且相關影響具有持續性，並非短暫波動。換言之，危機不僅促使船公司改道，也會將壓力逐步傳導至碼頭、堆場、拖車、貨代、倉儲和收貨人等供應鏈環節。當船期開始失準，整條供應鏈便會隨之受壓，這正是香港物流業最熟悉也最不能忽視的風險。

另一項值得重視的問題是，紅海危機的影響並非平均分布。它不是簡單按地理距離遠近擴散，而是沿着航運路線與港口網絡功能傳播。例如，北美東岸、西北歐和東南亞部分港口，既受到即時衝擊，也承受持續性壓力；另一些地區即使初期影響有限，之後亦可能逐步被拖入阻塞狀態。這說明全球港口體系並非地圖上一個個孤立的點，而是一張高度互相牽連的網絡。

這對香港有重要啟示。香港不能只以地理距離判斷風險，而要從航運網絡位置評估影響：香港與哪些國際樞紐港相連？哪些貨流可能因改道而重新分配？哪些班輪服務可能因外圍港口擁堵而受到延誤傳導？當大型樞紐港承受更大壓力時，香港既可能面對班次不穩、船舶靠泊節奏改變，也可能在特定時段承接更多轉運需求。換言之，危機同時帶來風險與窗口，關鍵在於港口營運者和特區政府能否及時識別、迅速應對。

綜合提高自身優勢

香港作為區域物流樞紐，現時最需要的是把「效率思維」升級為「韌性思維」。

第一，港口和航運企業應建立更即時的風險預警機制，不能等到船期全面混亂才被動補救。面對地緣政治、航道安全、極端天氣和制裁等不確定因素，愈早掌握貨流變化和船期延誤，愈能爭取調度空間。

第二，碼頭與物流業界應預留彈性資

源，包括臨時泊位安排、夜間操作能力、人手後備、堆場調度及拖車支援，避免小延誤演變成大堵塞。供應鏈最怕的不是一次性衝擊，而是局部擁堵不斷累積，最終拖慢整個系統。

第三，貨主與貨代應更早採用情景規劃，為關鍵貨種設定替代航線、備用倉庫和更寬鬆的交付窗口。以香港零售業為例，若一批歐洲來港貨物因紅海局勢延誤，企業不能只問「何時到港」，還要同步考慮：是否有替代補貨方案？哪些貨品可先行拆單處理？空運是否只應用於高毛利或急需貨品？同樣，工業客戶亦應檢視安全庫存和供應商地理分布，避免過度依賴單一路線。面對地緣政治風險，最昂貴的往往不是備貨，而是沒有備案。

由於危機具有明顯的航線網絡傳導特徵，港口政策也不能只着眼於單一港口效率，而應置於區域供應鏈協調之中。對香港而言，這意味着需要更強的跨部門聯動。運輸、海事、貿易、海關、創科與經濟相關部門，應加強風險資訊共享，建立更快速的協調機制。若完全依賴市場自行調節，外部衝擊往往會被層層放大，最後由出口商、進口商以至市民共同承擔成本。

政策改革應對危機

特區政府可考慮鼓勵碼頭及物流企業提升情景應變能力，而不只是追求單一效率指標。特區政府亦可支持業界建立港口運作數據平台、班期延誤監察系統、貨流預測工具及多式聯運備援方案，提升整個物流系統的視視化程度。同時，應協助中小物流企業提升數字化能力，讓它們在船期延誤、倉儲壓力增加時，仍能快速重排運輸和交付。面對紅海危機這類長尾風險，政策重點不應是追求「零影響」，而應是做到「少中斷、快恢復、可轉換」。

香港亦應把握危機中的窗口。危機並非只有負面一面。當部分航線受阻，某些樞紐港會吸收更多貨流，也會形成新的轉運需求。若可在服務穩定、通關效率、資訊透明和高增值物流方面保持優勢，便有機會在國際航運重組期間鞏固甚至提升樞紐角色。這尤其適用於高時效、高價值或需要複雜協調的貨種，例如電子產品、醫療物資、時裝和食品冷鏈。

香港要在不穩定時代維持國際航運中心地位，要朝着更快的決策、更準的數據、更有彈性的營運安排，以及更強的跨界協同能力轉型升級。

紅海危機提醒我們，全球供應鏈已進入高波動常態。全球港口已不再是孤立的物流節點，而是高度互相依賴的風險傳導系統。紅海危機令港口周轉時間上升，影響遍及不同地區與不同類型港口，並對大型港口和自動化碼頭帶來更明顯壓力。

對香港而言，這既是警號，也是機遇。趁此強化港口韌性、政策協調和數字監測，本港物流體系不但可以減少外部衝擊，更有機會在全球航運重組中保持優勢。

毫秒之差關乎國安 時鐘同步共築防線

姚兆明 | 香港大學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碩士課程總監



各位讀者是否曾注意到，只要設定正確，無論您身處哪個國家或地區，所有行動裝置的時間都保持一致？這是因為，我們的行動裝置通過網絡時間協議（NTP）與時鐘同步伺服器進行連接和校準。通常，在手機的設置功能裏，儘管不同型號的手機設置略有不同，但如果您允許位置跟蹤，則您的移動設備始終顯示相應位置的準確時間。這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許多時鐘同步伺服器（也稱為網絡時間伺服器）。設備會自動連接這些伺服器並取得正確的日期和時間。因此，無論您在何處，您的手機或行動裝置都能立即為您設定正確的日期和時間。

在香港，香港天文台（HKO）是負責營運網絡時間伺服器以規範本地時間的官方政府機構。在世界各地，同樣有各國官方機構負責維護其所屬的時間同步系統與授時服務。因此，時鐘同步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基礎設施，甚至關乎國家安全的核心環節。

為什麼時鐘同步如此重要，尤其對國家安全？

對一般人來說，時間偏差一分鐘甚至幾分鐘都無關緊要。然而，如果我們思考人工智能和自動化規劃在製造業、軍事行動、交通管制等領域的應用，那麼就是毫釐之差都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，必須精確到毫秒甚至微秒級別。舉個例子，以交通號誌為例，現在絕大部分交通號誌系統都使用網絡時間伺服器；在十字路口，如果交通號誌的時間誤差在1-2秒，兩個號誌燈都可

能顯示綠燈，進而導致交通事故。又或者，火箭發射必須在精確的時間窗口內完成點火與分離程序，時間精度必須做到微秒級別，任何偏差都可能導致任務失敗甚至發射事故。

我國授時中心位於陝西省西安市，承擔「北京時間」的產生、保持和發播任務，為國家通信、金融、電力、交通、測繪、國防等行業領域提供高精度授時服務，還為測算國際標準時間提供重要數據支撐。國家授時中心自主研發了世界領先的時間自主測量系統，還建設有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——高精度地基授時系統，相關設施一旦遭受網攻破壞，將影響「北京時間」的安全穩定運行，引發網絡通信故障、金融系統紊亂、電力供應中斷、交通運輸癱瘓、空天發射失敗等嚴重後果，甚至可能導致國際時間陷入混亂，危害損失難以估量。

正因為時鐘同步對國家安全和社會運作如此重要，美國國家安全局（NSA）長期針對我國國家授時中心進行網絡攻擊活動，行動高度隱匿，甚至動用了國家級網絡間諜武器。如今，攻防可能由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系統控制。想想無人機，它們都依賴同一時鐘同步才能協同工作。如果網絡時間伺服器遭到攻擊並提供錯誤的時間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因此，無論是出於個人私隱保護的考量，還是宏觀角度下的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穩定，時鐘同步與網絡時間安全都是重要的基礎保障。我們在日常使用要提高警惕、注意設備安全設定，更應築牢網絡安全防線，對個人移動設備的時間校準與安全防護給予充分重視。

以教育改變命運

施志勁 | 教聯會理事



站在香港這片繁華土地上，我們或許難以想像，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樂業縣新化鎮百坭村，曾有一位年輕女士，用她短暫而燦爛的生命，為「脫貧攻堅」四個字寫下了最動人的註腳。她就是全國脫貧攻堅模範、百坭村第一書記黃文秀。當她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三十歲那年，她留下的不僅是百坭村脫貧的成就，更是一種精神的燈塔，照亮了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前路。

黃文秀從北京師範大學碩士畢業後，毅然回到家鄉百色，主動請纓擔任第一書記。她曾說：「自己是從貧困山區走出來的女兒，我要回去幫助更多的人。」她將扶貧視為自己「心中的長征」，用腳步丈量每一寸土地，用真心溫暖每一戶人家。在她身上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扶貧幹部的擔當，更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情懷——因為真正的扶貧，從來不只是物質的輸送，而是點亮人心、啟迪民智的工程。

教育是脫貧的鑰匙

教育，正是當代脫貧攻堅的主陣地。無論是在廣西的深山，還是在香港的都市，貧窮從來不只是經濟的匱乏，更是視野的狹窄與機會的缺失。惟有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，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學習機會，國家的未來才有希望。黃文秀書記若沒有接受教育，便不可能走出大山，更不可能帶着知識與能力返回家鄉。教育，正是最根本的脫貧之鑰匙。

作為香港基礎教育的教育工作者，我們或許無需面對山區的泥濘與風雨，但我們同樣站在脫貧的第一線——香港的貧富懸殊、跨代貧窮、學習機會不均等，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「貧困」。黃文秀書記的精神，正是我們可以借鑑的明燈。

首先，我們要做到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」。教育的初心是什麼？是讓每一個孩子，不論出身、不論背景，都能獲得成長與學習的機會。香港有許多基層家庭的孩子，他們或許缺乏課外資

正確理解商標概念 兼顧文化保護與商業應用

沈燕玲 | 意大利博科尼管理學院亞太區大使 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副主席

最近，新銳國潮茶飲品牌「茉莉奶白」因其四葉花卉標誌（Logo）與外國皮革用品品牌LV的經典圖案Monogram高度近似，被判賠償1,030萬元人民幣。判決一出，迅速在中外社交媒體激起一片對文化挪用、文化保護以及品牌霸權欺壓的輿論風暴。公眾的憤慨集中於「西方大牌搶奪東方遺產」、「得了便宜還倒打一耙」等等。外國網友也幫忙「扒」出，西方奢侈品牌掠奪各國文化遺產已是「慣犯」。

確實，捲入這場法律爭議中的圖案——四瓣花卉圖案，從唐代寶相花紋、蘇州園林花窗，到日本正倉院珍藏的唐代螺鈿琵琶，早已在中國美學的長河中流淌了千年，遠比任何西方奢侈品牌的歷史更為悠久。然而，從現代商業的運行規則、法律邏輯，以及文化傳承層面進行理性且辯證的審視，案件判決真正刺痛的，是一個關乎現代商業主體性與文化敘事權的深層命題。

傳統文化與商業法律衝突的刺痛

從技術層面來看，LV獲判勝訴，確有理據。LV的四葉花卉圖形商標早在1980年代進駐內地時就已完成註冊。現代商標法的核心功能是識別商品來源，而非考證文化起源。LV歷經全球市場超過百年的持續經營、營銷灌輸與高昂的維權成本，這個符號與LV品牌，早已深入人心。當消費者看到圖案，大多聯想到LV，這就是現代商業規則賦予其產權保護的合法依據。

在現行法律下，傳統文化圖騰不適用於商標法，法律只承認商業邊界的劃定與維護。如果中國品牌不轉換思維，那麼未來在全球商業競爭中，類似的被動與陣痛只會一再上演。

這場風波帶來的另一個深刻啟示，是關於文化的傳承與保護。我們必須建立一種動態發展論和主動保護防禦機制和體系，而非「靜態冷凍論」。輿論常有一種誤解，認為保護文化就是要把符號鎖進博物館，或者不許外人觸碰。但事實上，任何一種文化符號如果失去了現代商業的活化與新陳代謝，就會淪為歷史的標本。

我們必須承認，西方奢侈品牌在借鑒東方美學時，展現出了極強的「轉譯與再生能力」。喬治·威登在1896年設計Monogram時，確實吸收了當時風靡歐洲的東方美學與東方植物紋樣，但他們透過長達一個多世紀的馬拉松式營銷，將其融入了當代的時尚語境，使其成為現代化的文化有機體。曾經在奢侈品牌行業深耕將近20年的筆者，深切親歷過國際品牌從設計到生產、從營銷到服務、從地區到全球，如何用不同的語言體系和情感表達方式，述說有傳承和生命力的品牌故事。對比之下，許多本土品牌對中華傳統美學的保護與利用，往往陷入了兩種極端：一種是「不容染指」的民族化保護與封閉，另一種則是「拿來主義」的淺層挪用。

源，或許家中沒有足夠的學習空間。作為校長，我經常提醒老師們：當我們走進教室，看到的不應只是二十五個學生，而是二十五個家庭的希望，是社會未来的主要建設力量。我們要像黃文秀書記般了解百坭村每一戶鄉親的需要，記住每一個孩子的獨特處境，按其不同學習需要來因材施教。

教育改革 惠及各階層學童

其次，我們要「勇於擔當」。黃文秀書記在暴雨之夜趕回百坭村，只因心中牽掛鄉親的安全。教育工作者同樣需要這份擔當——當社會出現「贏在起跑線」的焦慮，我們要敢於倡導全人教育；當考試壓力讓孩子喘不過氣，我們要勇於設計多元評核；當家長對教育感到迷茫，我們要主動搭建家校溝通的橋樑。「擔當」就是在困難面前不退縮，在質疑聲中堅持做對的事。

更重要的是「甘於奉獻」。黃文秀書記奉獻了青春乃至生命，而我們奉獻的正是日復一日的耐心與愛心。在香港小學，我們可以具體踐行這種精神：如設立「課後支援計劃」，為基層學童提供免費課業輔導；推行「師生共讀」活動，讓每個孩子都能熱愛閱讀、熱愛學習；推行「生涯規劃」，讓孩子從小看見未來的多種可能。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，正是我們「心中的長征」。

黃文秀書記曾說：「長征的戰士死都不怕，這點困難算什麼？」今天，香港教育也正面臨諸多挑戰：人口結構變化、數字轉型、價值觀塑造等，但比起百坭村的山高路遠，這些困難算什麼？只要我們擁抱同樣的信念——用教育改變命運，用知識切斷貧窮的代際傳遞——我們就能走好屬於香港教育的長征路。

讓我們記住：不放棄每一個孩子，就是教育使命的勝利；每一間用愛經營的教室，都是國家未來的希望。黃文秀書記用生命點亮了信仰，而我們要做的，是讓這盞燈在香港的校園裏永遠明亮。

商標美學要符合文化內涵與法規

「茉莉奶白」事件，正是缺乏獨立的現代商業邏輯下美學建構的後果。如果我們僅僅因為一個符號屬於中國傳統，就允許本土品牌不加提煉，甚至以高度模仿西方大牌的形式粗暴複製，這並不是真正的文化保護，而是對傳統美學的消耗與矮化。我們不能把傳統文化當作商業侵權、設計偷懶或不思進取的擋箭牌。真正的與時俱進，是我們必須有自信、有能力能拿出比西方奢侈品牌更有文化內涵、更符合當代審美的東方敘事，這也是中華文化自信在國際市場中的重要體現。

理性看待這場風波，我們需要的不是抵制，而是如何融合東方和西方的文化，反過來利用這套世界通行的商業語言，進行系統性的防禦與反攻體系的構建。這才是真正從內在文化核心述說中國的故事，讓全世界看見。

雖然如此，當前商標法保護私有產權，的確可能導致公共文化資源被資本變相私有化，為此內地亟需建立「中華傳統文化符號公共清單」與基於現代科技發展下的「數字化文化基因庫」。對於清單內的公共紋樣，應大幅提高商標註冊的獨創性門檻，防止任何品牌（無論中國或者海外）進行簡單的幾何抽象便將其據為己有。當發生跨國產權爭議時，這些數據庫能作為強有力的「在先文化使用」法律證據。

建立完備文化清單並註冊保護

另一方面是發揮龍頭行業協會或地方政府的專業性優勢，將具有強烈地域及行業的文化屬性的美學元素（如蘇州園林花窗、景德鎮青花紋飾）註冊為「集體商標」或「地理標誌」。如法國用「香檳」制度保護了整個產區的品牌價值一樣，中國也應通過集體產權模式，讓特定的傳統紋樣成為區域內企業合法、共享的商業資產，在規則內形成合力。

國際奢侈品牌的溢價，來自他們創造品牌宇宙和情感認同的能力。中國品牌必須從符號「借殼上市」升級為「東方價值產出」。例如，唐代的寶相花，本身就是佛教藝術傳入中原後，歷經數百年華夏文化融合、創新而誕生的美學奇跡。它的基因本就流淌着包容、流動和與時俱進。保護這個中華傳統美學符號的最好方式，是讓它在現代的規則與土壤中，開出更具生命力、更有尊嚴的新花朵。

當未來的某一天，另一個含有寶相花圖案的中國品牌走向巴黎或紐約，能夠氣定神閒地告訴世界：「這個視覺符號源自我們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寶相花，它代表着東方的圓滿與包容，而在今天，我們用當代的設計，賦予了它屬於這個時代的新靈魂。」那一刻，我們才算真正拿回了屬於自己的文化敘事權，真正說好中國文化故事。